

朱文轶 著

进城： 1949

张其成 著

进城

1949

▲ 磨房街

朱文轶 著

进城： 1949

K928.5
Z88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城:1949/朱文轶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633 - 9347 - 3

I . 进… II . 朱… III . 城市史—史料—中国 IV . K928.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414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策 划 人:郑纳新 杨志友

责任编辑:杨志友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6. 5 字数:100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1. 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序 言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国民党垮台的迅速也令共产党失去了更多在时间中磨炼和学习的机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这不只是管理一块边区或根据地，而是管理一块三倍于西欧大小，有着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

近代中国，共和与统一的声音最为深入人心，但导致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式弱并没有得以改观，并且，多年以来，管理一个大国家的经验已经很陌生了。

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暂时解决了中央一次次的“军事危机”，却产生了脱离中央财政控制外的经济系统，它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甚为深远。事实上，清王朝倒台以后，政府所汲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间，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北洋政府的维持主要靠各种国内外的贷款。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尽管煞费苦心进行了财政体制的转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国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个政府收入不过只有GDP的8.8%。这也是蒋介石主持的南京中央政府期间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方略”付诸实施却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1949年新政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了超过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对刚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而言，这注定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试验。

另外，国家基础结构重建的挑战同样显而易见。传统中国里的中央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乡村或城市基层，地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给了当地宗族、行会，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后者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补充——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正是府州县官与地方民间力量的巧妙平衡。而当中央政府衰败后，这种维系长达数个世纪的平衡显然被破坏了。中央已经失去了控制这种地方组织的能力。随着地方组织变得强大，组织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权力不

可避免地集中于靠军事话语权发言的军阀手中。辛亥革命的领袖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在一个短暂的国家试验中，国民党统一了中央政权，扩展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并诉之于三民主义情感，在初步的军事统一后，他们试图发动广泛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国家地方基层的支持，他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实际上既受惠又受制于权贵资本和军阀。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多年在农村的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但这套系统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热情能否转化为严格有序的组织，并创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在1949年初，仍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选取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因此在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商榷之处。

我无法将本书定义为一本历史著作还是一本新闻著作，它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他们中一部分是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团队成员，一部分是见证历史变迁的行业元老，他们大多早就年过古稀，回忆往事是留予后人的财富。我要特别感谢这些老人，并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书正是用新闻的方法来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为历史现有的叙述拾缺补全。

我秉持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我们重述历史，是去寻找历史中的“五个W”，对历史当事人进行新闻采访，而放弃对既有史料的依赖，摆脱对于过去一套

历史系统的话语体系和发现体系的依赖。本书的成形得益于一系列截稿时间压力下的采访和写作，得益于我供职的《三联生活周刊》，也得益于这本杂志从数年前抗战系列报道开始，所摸索和积攒的历史再述和解释经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成员正在进行的各种新闻操作和方法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思路开放、智力卓越的媒体，如果没有一群热爱这份职业的同仁们，这本书是断然不会面世的。

目 录

序 言 / 1

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 / 1

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 / 32

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 / 52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 / 73

1949年的广州 / 121

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 / 174

后 记 / 198

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的。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接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刚刚展开。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和随着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以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这个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政党，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是农村问题专家，是土改运动的发明人。它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了这个国家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但它的确仍然是“城市”的门外汉。根据地经济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人们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与工厂、银行、法院，乃至邮电系统、医疗机构打交道。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最熟悉的城市不过是面积3.7万平方公里、“只有几座窑洞”的延安。一年后，当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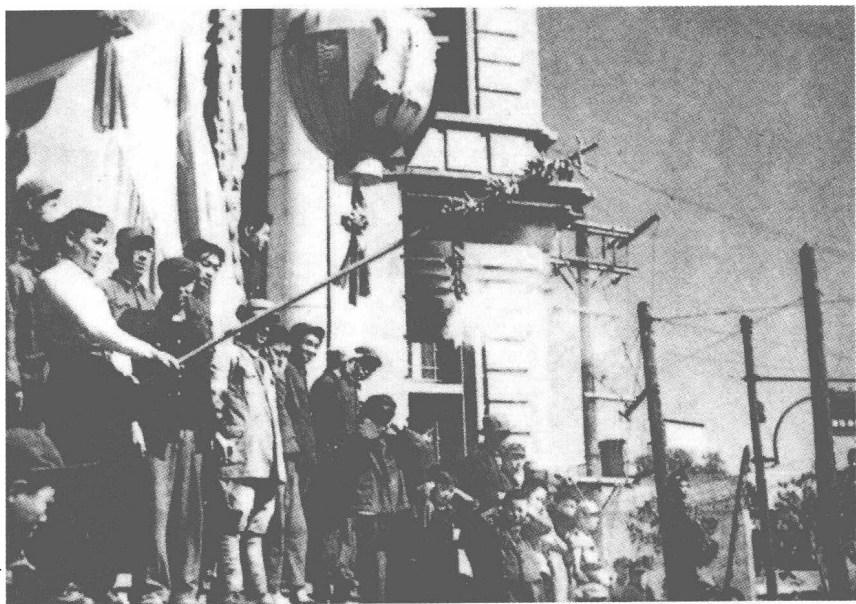
共产党及其军队就再次从延安退回到了农村。

当1947年战略反攻后势如破竹的军事胜利将一座又一座大城市送交给中国共产党时，领导者们发现，他们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他们在农村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令毛泽东和陈云担心的“打烂机器”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时，少数部队就随意没收商店，没收敌军官家属的财产，强行令商人捐款。在中央对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高家堡事件”进行全军通报批评和纪律教育后，在石家庄，相似的事情继续出现：一些部队后勤人员闯入工厂，搬运器材、拆卸零件、砸毁厂房，纵容城市贫民哄抢公用物资。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成为对新政权的巨大考验。

1948年3月，陈云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出“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转移”。陈云对东北全党指出，从前我们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农村，现在农村有了基础，城市工作的地位就要加强，要抽调力量做城市工作了。首先是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要像动员1.2万名干部下乡搞土改那样，来配备和加强搞工业建设的干部。东北局于是决定将东北局与各省、地、县委的“民运部”一律改为“城市工作部”。

比起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第一站石家庄，沈阳的优势在于，市内和近郊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城市框架保存完整。那么，共产党能否在这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呢？

沈阳，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一个历史转



1949年10月1日，沈阳市民燃放鞭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折。对陈云和初步接触城市的干部们来说，沈阳更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实验。如何克服长久以来游击主义的影响和小农意识的惯性？如何将一个已经失去生气的城市重新点燃？事实上沈阳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沈阳刚从区域分割的状态中走出来，商品流通艰难；工厂破败不堪，八大厂（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不光是整个东北，几乎是全中国的战略命脉，迅速恢复生产力并不只是一纸文件那么简单。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动员工人的同时，也要调动职员积极性和兼顾资本家利益，它需要当权者赋予“劳资关系”新的理解和内容。

沈阳只是中国大城市的一个代表，它让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理论不停留于观点，而有了付诸应用的机会。它也给了中国共产党难能可贵的实践和极富价值的启示：要使新中国启动向前，需要调动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和经济环境的持续性。富有深意的是，当沈阳的经验推诸天津、北平、上海时，新政权已经通过一系列大城市接管，完成了它制度设计的初步框架。

转 折

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飞离沈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的身影正在离他远去。

此前半年，东北的据点对国民党来说就已经失去控制了。国民党军队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国民党军撤到长春，却给当时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负担，人民解放军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失去吉林三天后就失守了，但人民解放军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这是这个月蒋介石第二次到沈阳“亲自”指导战事，第一次是在10月初。他在沈阳的日子并不愉快，除了战争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手下跟他阳奉阴违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对几个重要将

领由此缺乏信任。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和他在国军主力是否撤出沈阳救援锦州上的分歧，令他极为光火。蒋介石隐忍愤怒，飞临沈阳，架空了卫立煌，直接命令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主力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切断解放军后勤补给线后，再向锦州前进。

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在1948年中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安眠药并没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他大多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才能有助于他人入睡。

尽管身处败局之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他常在日记中夹进当天有重要时事和军情进展的剪报。但日记上的语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率无忌了，1948年5月以后的蒋氏日记，字体也有了明显改变，和他的心情有关。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了“沈阳”，但显然极力在隐藏自己情绪的沮丧。

早在这年4月，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头头大卫·G. 勃尔就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放弃东北，以北平为后方。徒劳的建议当然完全没有奏效，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甘心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拱手送人。谁都清楚东北对于全盘战局的意义，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并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

击。相反，如果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一个极具生产力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都是块难啃的“骨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承认，“抗战胜利后，中共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但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之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15年之久”。而国民党接管东北后的形势同样不乐观，苏联人始终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心患，长期囚禁张学良的旧怨让东北人民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国民党手上有一堆琐碎的事情要应付：要一一接收沦陷区的政权，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几百万日本军人和家属遣返日本。

结果，不到两年，国共在东北的形势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人民军队在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群众基础。在“北满”的宾县，一个叫马斌的县委书记和农民亲如一家，农民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他的办公室。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加以总结，并推广到全党。“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陈云由此要求在东北的干部“大官做小事”。毛泽东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于“延安失守”的评价时，也自信地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相反，为了紧紧抓住东北的控制权，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却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独断专行地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这些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激化了当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占据着大部分重要职务，这简直是“对东北的占领”。

派系斗争让沈阳成了个松散、让人头疼的地方。作为东北的经济中心，它的吏治腐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日伪时期留下的大批工厂，成为国民党官员赴任后受贿寻租的工具，几乎每个工厂背后都有官员的身影。

1947年受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刚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简直无药可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切太不正常了。”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军官放着带兵打仗的职责不做，却忙着开报馆、办学校、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

从军事的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